

中州名家集

江淹集校注

俞绍初 张亚新 校注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

俞绍初 张亚新 校注

中州名家集

江淹集校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號

中州名家集
江淹集校註

俞绍初 校注
张亚新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省地理研究所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413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一版 199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刷 1—1500 册

ISBN7—5348—0062—5/I·33

定价 13.5 元

舟

學

PDG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重辑、重校、详注南朝梁著名文学家江淹诗文的专著。

江淹，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在今河南民权县境内）。他的诗文凄惋顿挫，浑厚深沉，在南朝流行的以绮丽浮艳为尚的文风中别树一格，其中《恨》《别》二赋尤为脍炙人口，至今传诵不衰。江淹生前曾自编前集和后集，后集已经亡佚，今天流传的十卷本《江文通集》大概就是前集。本书是在明人胡之驥《江文通集汇经》本的基础上，将江淹的作品重新加以编排校注而成。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江淹的创作，分诗、赋、文三类；下编系代人而作的章、表、诏令一类的应用文。每类作品略依写作时间为序编次。在注释上，注意广泛吸收前人的成果，又纠正了旧注的一些失误，力求作到简明通俗。书后附有《江淹年谱》和《江淹诗文集评》，可供读者研究和欣赏时参考。

《中州名家集》编辑说明

河南省地处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今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有选择地整理研究这批文化遗产，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缺少的条件。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中州名家集》。

本丛书收录范围以古代河南籍中较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长期寓居河南的作家的名著。有些大家虽属收录之列，因其著作在建国后已有较完备的整理本出版，为节省人力物力，本丛书一般不再收录。本丛书收所收以文学家的著作为主，同时兼顾其他社会学科的著作。自然科学著作概不收录。

本丛书所收著作，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作认真的校订并加新式标点和必要的笺注，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便于研究和阅读的本子。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能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3月

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尹 达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从遥远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先人，就生活、战斗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用劳动的汗珠和智慧的雨露，浇灌着古代东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奇葩。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些名家，是在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我们民族的精英。他们的作品，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结出的硕果。自殷商“有册有典”以来，中华民族便以丰富的文化典籍而闻名于世。

对待先人留给我们的这份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远视眼”，对待本民族的先进东西视而不见，却翘首西望，幻想用所谓的“西方文明”，来填补自己的无知和空虚。这种态度，在一些同志中间，似乎很“时髦”过一阵子。一种是“近视眼”，对别国、别民族的先进东西看不见，却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封建糟粕视为国之瑰宝，宣扬什么“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在“整理国故”的旗号下，一头钻进故纸堆中，抱残守阙，敝帚自珍。过去，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就曾持这种态度。

很显然，这两种态度，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

把中国文化看做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是中国古代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我们都“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更珍视本民族的东西，更珍视自己先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这种珍视，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搞“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而是要以之激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更加自觉地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我们正在党中央领号下，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这样的时代，批判地继承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更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精神生产，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都必须在民族传统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永葆我们民族的特色。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应当通过自己的工作，使每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个青年人，都充分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既然能创造出那样灿烂的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也完全有信心，在党的领号下，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继承祖国古代文化遗产，有许多工作要做。古籍整理，便是其中之一。我国古代典籍源远流长，浩如烟海，仅传世至今者，即不啻十万种，为举世所罕见。这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标志，是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历史积累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不少典籍，由于年荒时远和兵火之毁，或仅存孤本，或严重残阙，加之所有典籍都是用古代语言写定，这就使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研

究遇到许多困难。倘若我们不对这些典籍进行有计划的整理，而是坐使典籍亡废，那就既对不起祖先，也可能使子孙后代由于看不到和看不懂祖国历史典籍，而造成民族优良文化中断的危险。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古籍整理，把祖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一件大事，我们有责任把这项工作做好。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凡是那些所谓“盛世”，差不多都曾在“美教化，移风俗”的旗号下，进行过大规模的古籍整理。虽然当时进行这项工作的主要目的，乃在“弘道设教”，即宣传和加强封建思想文化对人民的统治，但其保存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功绩，却还是应当肯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优越千万倍，我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应该，也有条件作出巨大的成绩。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已做了许多工作，与我们的伟大时代相称。

古籍整理，一般包括标点、注释、校勘、辑佚等工作。要做好这些，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素养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但仅仅做好这些还不够，还应当把古籍整理工作同科研工作和普及工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才会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才能分清轻重缓急，才能突破前人的圈子，创出新的水平。这样整理出来的古籍，也就不仅仅是一篇篇孤立的文献，而是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教材，使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典籍，在社会主义中国迸发出生命的活力。

司马迁主张“述往事，思来者”。王夫之、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我们整理古籍，归根到底，也是要以之丰富和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列宁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我们要学习马克思的

榜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重新加以“探讨”（同前）。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充分利用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典籍，写出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经济史、政制史、民族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切实有用的借鉴，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把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了帮助更多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同志能够读懂古籍，还应有选择地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名著，附以准确明晓的今译，让典雅古朴的民族文化，在更多的心海里激起振兴中华的浪花。

我国是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国家之一，祖国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地区上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不仅从经济上、政治上表现出来，而且常常更多地表现在思想文化上。各个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民族构成、风俗习惯的不同，政治、经济发展上的先后，以及历史的原因，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渐形成不同的学风，不同的学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性，从而构成祖国文化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的壮丽画卷。如果我们对祖国思想文化史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就不可能对各个地区的思想文化渊源获得正确的认识。同样，如果我们不对各个地区思想文化史的特点作具体深入的研究，也就不可能科学地把握祖国每个特定时期思想文化史的全貌。祖国思想文化史这种丰富多彩的地区差异性，在古代典籍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不同地区作家的作品，往往有着鲜明的不同的风格，表现出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学术倾向，甚至连版本也明显的不同。因此，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在全国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各地有计划有重点地对本地古代作家留下的典籍作些整理，出一些名家名集，显然是有必要的。这对

于我们了解祖国各地历史文化典籍的状况，研究各个地区的思想文化史；对于我们向青年一代进行乡土文化教育，培养他们爱故乡、爱祖国的思想，都有着现实的意义。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同志们计划出一套《中州名家集》丛书，他们所做的，正是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河南地处中州，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乃所谓“声灵赫濯之区，文物衣冠之藪”（王上俊：进《〈河南通志〉表》），才隽迭出，代有名家，自古获人杰地灵之誉。历史上的中州名家，在灿烂的祖国古代文化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作品，不仅是河南乡土之瑰宝，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文化。诗圣杜甫（河南巩县人）的一部《杜工部集》，正是有唐一代现实主义诗歌的结晶。那如泣如诉，催人泪下的“三吏”、“三别”，至今还是我们认识封建制度下人民悲惨生活的生动教材。民族英雄岳飞（河南汤阴人）的一部《岳武穆遗文》，更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那“千载后读之，凛凛有生气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满江红》词，今天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不朽名篇。中州古籍出版社的同志们在整理、编辑《中州名家集》时，注意了学术性和普及性的结合。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河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学术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将是一个促进。

河南是我的故乡，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我最初的学术活动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由于革命的需要，我很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的山山水水，风俗人文，始终在我心海深处印记着亲切的回忆。犹如游子怀念慈母，我的梦魂时时扑向故乡的怀抱，向她倾诉我的深情，表示我的希望。得知故乡的出版部门，要将故乡历史上的名家名集编辑成一套有系统的丛书，我是

很高兴的。我希望早日看到这套丛书，并愿和同志们一起，为建设祖国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再作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前 言

江淹（公元444—505年），字文通，是南朝宋末至梁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祖籍济阳考城（在今河南民权县境内。详见《年谱》），先世因避西晋末年之乱逃往江南，大约寄住于今江苏丹徒县一带。江淹出身贫寒，其祖父和父亲都只做过县令，《南史》本传说他“年十三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在《待罪江南思北归赋》中，他也自称是“北州之贱士”。二十岁时，游学京都，以五经授始安王刘子真，又为南徐州从事，奉朝请，从此踏入仕途。前废帝继位，转建平王刘景素幕下，因被怀疑受贿，遭冤狱，于狱中上书，得出。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右常侍。后为右军建平王主簿，随建平王景素在荆州。时后废帝刘昱凶狂失道，景素欲羽檄征天下兵，以求一旦之幸。淹每从容晓谏，景素不纳。及镇京口，淹为镇军参军，领南东海郡丞。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淹知祸机将发，乃赠诗十五首以讽。后因南东海太守陆澄遭丧去职，淹求代领郡守职务，触怒景素，被黜为建安吴兴令。顺帝升明初，萧道成辅政，闻其才，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掌记室，为萧道成起草军国文书，这成为江淹仕途生涯的转折点。入齐不久，即迁正员散骑侍郎，中书侍郎。永明中，兼尚书左丞，领国子博士。郁林王萧昭业时，兼御史中丞。明帝即位，累迁秘书监，侍中，卫尉卿。东昏末，以秘书监兼卫尉。梁武帝萧衍起兵，淹微服归附，在梁代官至金紫光

禄大夫，封醴陵伯。卒，时年六十二。

江淹自依附萧道成后，官位日显，一般说来尚能清谨自守，也多少做了些事业。如任御史中丞时，秉公执法，不避权贵，凡贪赃枉法者，上至中书令，下至州牧郡守，大县官长，多被弹劾惩治，一时“内外肃然”，得到了当时参与执政的齐明帝萧鸾的赞誉。但总的来看，江淹政绩平平，在政治上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他之所以名传后世，是由于他在文学上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我国文学发展到南朝，经历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自西晋末年以来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被山水诗所代替，使文坛呈现出一番新的气象。但以颜延之、谢灵运为代表的“元嘉体”在艺术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过分雕琢字句，堆砌典故，使“文章殆同书钞”（钟嵘《诗品序》），陷于生涩板滞；二是“典正可采，酷不入情”（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未能将客观景物的事绘与主观感情的抒发有机地结合起来。鲍照与颜、谢在创作上走着不同的道路，但他的一些作品也不免失之雕琢。这种情形在其他文体中同样存在，如谢灵运的《山居赋》就因疑难太多，行文间不得不夹上大量自注。以沈约、谢朓为代表的“永明体”诗人似乎看到了“元嘉体”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的文学主张。《颜氏家训·文章》云：沈隐侯（约）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同时或稍晚的刘勰、钟嵘、萧纲等则强调了诗歌要“为情造文”、要有“滋味”、要吟咏情性的特点。“永明体”诗人在实践中更作了大量工作，如沈约所作的《夜夜曲》、《别范安成》、《伤谢朓》、《早发定山》等诗语言朴素动人，风格清新可喜，感情也比较真挚。谢朓诗明白晓畅，秀丽清新，情景交融，在这方面更做

出了突出的成绩，最后完成了“元嘉体”向“永明体”的转变。同时，其他文体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江淹历仕宋、齐、梁三朝，习惯上被视作梁代作家，但其保留至今的作品大抵都作于宋末齐初，正处在“元嘉体”向“永明体”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当时文风转变的契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值得重视和探讨。

江淹诗现存一百四十多首，绝大部分是五言古诗，少部分是四言、七言古体和骚体。江淹善于拟古，这是自钟嵘以来几乎一致的看法。建国之后，不少论者往往以“缺乏独创性”为由对其拟古之作持贬抑否定态度，又往往以对拟古之作的评价值来代替对江淹全部诗作的评价，这是颇值得商榷的。江淹的拟古之作主要有《杂体三十首》和《效阮公诗十五首》，我们不妨对此略加分析。《杂体三十首序》云：“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岂所谓通方广恕，好远兼爱者哉？……今作三十首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以钟嵘《诗品序》中“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一段话证之，江淹所言不虚。其拟古的目的在于表明，汉魏以来的优秀作品虽在词藻和声律运用上具有各不相同的特色，但都达到了“动魄”、“悦魂”的艺术境界，符合“美”且“善”的要求，从而对当时评论界“各滞所迷”、“随其嗜欲”的偏颇表示不满和非议。江淹所说的“美”是指“貌”，即诗歌所描写的客观事物；所说的“善”是指“气”，即诗歌所流露的主观情志。这种强调诗歌应以表现“情物”为主的主张，直接影响着后来的陆厥和钟嵘等人的观点，在永明中展开的有关诗歌创作问题的论辩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别出心裁地以拟作来委婉显示自己意见的作法也

颇新颖。不妨聊备一格。拟作本身又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作者善于捕捉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特点较为准确地予以表现，不少作品确能做到面貌酷似，如对前人遗产没有深入的学习、精到的体会，如没有非凡的笔力显然是难于奏效的。萧统将《杂体三十首》全部录入《文选》，占入选江诗的大部分，可见对其艺术价值是深为首肯的。由于比较准确地再现了各个时代的诗风，因此将三十首诗连起来细加研读体味，可大体看出自汉至晋宋数百年间五言流变的轨迹。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对于摹拟对象的取舍之间未尝没有反映出个人性格志趣、思想感情的影子。如《古离别》、《李都尉从军》、《张司空离情》、《陆平原羁宦》、《谢法曹赠别》、《休上人怨别》所写的失意索寞之感等，都是江淹诗赋所经常表现的主题，是其早年心境的曲折反映，至于《效阮公诗十五首》的写作有着更为明确的针对性，其目的在于对刘景素的反乱密谋进行讽谏。但因其密谋尚未公开，江淹也就不便直言规劝，只得以拟古为名将规讽之意隐约曲折地表现出来，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忧谗畏祸和不得志的心情。这种拟古实即述志抒怀，对后来庾信《拟咏怀》、陈子昂《感遇诗》等的写作不无影响。总之，江淹的拟古诗同西晋以来大多数机械拟古之作很不相同，是不能仅仅从独创性的角度来加以规范和要求的。当然，这些拟古之作虽不可忽视，但既非江淹诗作的全部，也不能代表其创作的一般特色。刘熙载说江淹“虽长于杂拟，于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艺概·诗概》），是有见地的。因此，我们还必须高度重视江淹的其他诗作。这些诗作大抵都作于宋末，集中在跟随刘景素和被贬吴兴两个时期。虽然有部分诗仍不免带着拟古色彩，特别是由于江淹的生平遭际与屈原有相似之处，一些作品从思想情调、表现手法到遣词造句均明显受到楚辞影响，几

首骚体诗及《逐古篇》、《杂三言五首》更直接地通向楚辞，但多数作品相当真实、具体、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当时不得志、遭贬黜的愁怨之情，同时也体现出相当鲜明的艺术个性。江淹十分重视对于所经所历的山川景物的描写，特别是入闽途中及入闽后对那些险峰深谷及“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的生动描绘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写景又往往结合着抒情，情与景谐，心与物融，具有相当强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风格有的古奥奇崛（如《渡泉峒出诸山之顶》、《游黄檗山》等），有的瑰丽幽深（如《清思诗五首》、《悼室人十首》等）。但就多数作品而言，两者兼而有之，形成了一种流利中带着苍劲峭拔之气的独特风格。其古奥奇崛的一面来源于汉魏古诗，“元嘉体”特别是鲍照的影响。由于江淹出身、经历与鲍照相似，鲍照抒写仕途不平的篇章易于引起江淹的共鸣，其立意高古、笔力雄健、气势充沛的艺术风格也易为江淹所效法，因此江淹的诗风与鲍照颇为相似，以至自隋以来屡有“江鲍”并称的提法。其瑰丽幽深的一面则与南朝民歌的影响有关，显示出与“永明体”相似的色采。显然江淹代表着一个过渡时期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兼具着“元嘉体”及“永明体”之长而能有自己的特色，这是其诗所以具有吸引力和值得重视的地方。

江淹的赋，现存二十七篇，全为抒情咏物小赋，多数作于被贬吴兴前后，以秀丽的色彩抒写了幽怨的情绪及遭受贬谪的生活。《恨赋》、《别赋》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两赋分写各种“饮恨吞声”的死亡和“黯然销魂”的离别，熔铸了作者个人早年独特的生活体验，同时也集中表达了那个动乱时代许多失意者的痛苦心情和人们普遍怨恨离乱的情绪，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作者善于通过典型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来揭示不同类型人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文词锤炼工丽，句法错综变化，音韵铿锵优

美，成为一时骈体文的杰作，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赋作，如《去故乡赋》、《倡妇自悲赋》、《青苔赋》、《水上神女赋》、《泣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四时赋》等，与《恨》、《别》二赋有着明显联系，有如众星环拱北辰，形成了一个愁怨之作的繁盛家族。江淹赋作对前代文学遗产也有着广博的摄取，我们不仅可从中随处见到《诗经》、楚辞、乐府、古诗的词语句法，内容情调也往往与之相通，正如张溥所说：“长短篇章，能写胸臆，即为文字，亦《诗》、《骚》之意居多。”（《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从赋体本身而言，虽然从《横吹赋》、《学梁王兔园赋》等篇中还可看到一些汉大赋好夸张铺陈、好用奇词僻字的痕迹，但从总体说来是继承并发扬了自王粲、曹植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同其诗作一样，江淹赋作更多更直接地接受了鲍照的影响。如以《恨赋》与鲍照《芜城赋》比较，不仅两赋都用了许多四字句和小部分六字句，句法都力求整齐，而且部分词句也颇相似（如“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之与“车挂檐，人驾肩，麈尾扑地，鼓吹拂天”，“亦复合酸茹叹，销落烟尘”之与“皆熏歇烬灭，光沉响绝”，“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之与“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等）。《别赋》、《青苔赋》、《哀千里赋》等也受到《芜城赋》的影响。《莲华赋》则与鲍照《芙蓉赋》有不少相似。由于存在这种种相似，因此产生了从赋的角度以“江鲍”并称的提法，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说：“淹抑沉怨，冷冷轻轻，其纵脱浮宕而归大常，江淹、鲍照其体则非也，其意则是也。”便是一例。江赋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刘宋时期的赋坛与其时的诗坛有某些相似，颜延之、谢灵运的赋作大抵是繁密的辞藻典实的堆积，缺乏真情实感。齐梁时期的赋作虽颇重抒情，但不免伤于轻靡。江淹赋作大都寓托有深沉